

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起源

[英] A. J. P. 泰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 A. J. P. 泰勒 著

何抗生 林鲁卿 译

闵光沛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A.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awcett Premier, New York Second edition, 1978

根据美国纽约福西特·普雷米尔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译出

DÌ ÈR CÌ SHÌJIÈ DÀZHÀN DE QIYUAN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A. J. P. 泰勒 著

何抗生 林鲁卿 译

闪光沛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70-7/K·169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5250 册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37 千

印张 11 5/8

定价：4.05 元

译者前言

本书是英国著名史学家 A. J. P. 泰勒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专著。泰勒 1906 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索思波特市，曾就读于素享盛名的牛津大学，先后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30—1938 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历史讲师，1938—1963 年任牛津大学梅格达林学院评议员。1956 年后为英国科学院高级会员。他多年从事欧洲近代和现代史研究，著述颇丰，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史的权威学者之一。此外，他还主持电视讲座，并为《星期日快报》、《观察家》和《纽约书评》等报刊撰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历史学家撰写了大量有关战争起因和绥靖政策的著作，其中正统学派的著述占重要地位。这一学派以英国史学家纳米尔、惠勒-贝内特为代表。关于战争的起因，他们归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恶性膨胀的侵略野心；关于绥靖政策，他们强调它的本意是维护欧洲和平，从而精心地为它辩护，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指责，如认为这个政策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是以让步求和平的消极政策。

本书于 1961 年问世。泰勒在原书中一反正统学派的观点，全面地提出了他对战争起因和绥靖政策的看法，因而使本书成为论述这个问题的修正学派的代表作。

泰勒在本书中对正统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阐释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而不是要么为其辩护，要么对其谴责。在深入研究从凡尔赛和约到

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事件后，他对德国政府及希特勒、对英法两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战略、策略和功罪是非，都作出了与正统学派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解释和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指出：不应该过多地谴责德国，把战争罪责全归于希特勒，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说法。“对手的失策，如同独裁者个人的不义一样，也是战争的起因。”因此，本书一出版便成为“当代最引人争论”的一本书。赞赏者说它是“一本最完美无缺的杰作”，“比传统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甚至“标志着改写战前时期历史的开端”；贬斥者则说它是“美化希特勒”，只不过是“较好地归纳了各种破烂和闲扯”。总而言之，它既作为一本“杰作”受到欢迎，又作为“反常和危险”的作品而遭到责难。

泰勒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日记或回忆录。例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文件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资料文件集》，《慕尼黑历史新文件集》，里宾特洛甫的《回忆录》，齐亚诺的《日记》和《外交文件》，庞纳的《保卫和平》(二卷)，还有职业外交官、大使及历史学家的著作等。另外，本书表达精练，文笔生动犀利，比喻贴切，更使它大为增色。

本书在西方史学界很受重视，影响巨大，已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芬兰文、荷兰文、瑞典文、挪威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我们将它翻译并介绍给我国读者。对于作者的某些论点，我们相信，读者当会自行鉴别。

本书中文译本根据美国纽约福西特·普雷米尔出版社1978年第二版译出。何抗生同志译第1—5章，林鲁卿同志

译第 8—11 章，闵光沛同志译第 6—7 章和书目提要及再思录，并校译全书。限于译校者的水平，译本中的疏漏和错讹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1991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被遗忘的问题	1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14
第三章	战后十年	41
第四章	凡尔赛的终结	66
第五章	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完结	97
第六章	半武装的和平(1936—1938年)	115
第七章	吞并:奥地利覆亡	148
第八章	危机笼罩捷克斯洛伐克	171
第九章	六个月的和平	215
第十章	神经战	248
第十一章	为了但泽而战	287
	书目提要	327
	再思录	335
	译名对照表	357

第一章

被遗忘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已有20多个春秋，从其结束以来也有了15年。身临其境的人仍然感到战争是他们切身经历的一部分。某一天，他们会突然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同以往的战争那样，也已经成为历史陈述。时至今日，一位大学教师就不得不提醒自己，他的学生在战争爆发时尚未出生，甚至也记不得战争结束时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学生们相距遥远，正如布尔战争与教师之间的时间距离一样长；学生们也许会从父母亲那里听说一些战争轶事，但如果要全然了解的话，多半就必须通过书本学习。一些大人物先后离开历史舞台。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已去世；丘吉尔也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有戴高乐还在再度掌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非“当今”，而成为“往昔”了，这就对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严格地说，现代史所记录的是那些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因此要按现代的眼光来作出判断，并且在读物中采取一种欣然同情的态度。在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面前，任何人也不会去贬低描写他伟大榜样的那些著作。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到来：如今历史学家可以用超然的态度来回溯、评论那些曾经是当代的事件，就如同他仿佛是在撰写主教叙任

权之争^①或英国内战史一样。至少，历史学家能够试着这样做一做。

历史学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作过这种尝试，但侧重点却不相同。他们对于战争本身相对而言没有多少兴趣。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关于重大战略的争执，被看作是劳合·乔治与将军们之间的个人冲突，学院派历史学家则绕过这个争执。英国官方的军事史的编写——它本身对这场个人冲突写得不少——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1948年才完成。除了军需部外，还没有尝试写一部正式的国内情况史。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和谈的努力，更没有人研究战争目标的发展情况。诸如伍德罗·威尔逊的政策这类具有决定性的论题，我们几乎不得不一直等到今天才进行详细的研究。使所有其它问题黯然失色并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兴趣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争是如何开始的。除意大利外，每个大国政府都大量公开本国的外交档案。严谨的历史学家的书橱里装满了各主要语言的书籍，但仍然为未能阅读其它著作而感到遗憾。许多法文、德文和俄文期刊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历史学家如英国的古奇，美国的费伊和施米特，法国的雷诺文和卡米尔·布洛克，德国的蒂姆、勃兰登堡和冯·韦格尔，奥地利的普里布拉姆，俄国的波克诺夫斯基等都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著名权威，此外还有许多名家。

这些作家中有的集中研究1914年7月的事件，有的则追溯1905年摩洛哥危机或俾斯麦外交。但都一致认为，对当时

^① 主教叙任权之争(1075—1122年)教廷与世俗君主为选任主教之争。

的历史学家来说，战争起源问题是吸引大家的兴趣的领域。大学有关的课程内容突然中止于1914年8月，因为某些事件仍在发展，学生们却深表赞同。他们想听到关于威廉二世和普恩加来，关于格雷和艾兹沃尔斯基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克留格尔的电报似乎比帕申德尔战役更重要，布甲柯条约似乎比圣·让·德·莫里恩纳协定更重要。决定今天情况的重大事件是战争的爆发。随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今天既不能提供教训也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 在一片混乱之中逐步实现其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已。一旦懂得了战争为什么发生，我们会明白我们是怎样走到那样地步的，当然也就会知道怎样才不再重蹈覆辙。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来，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读者和作者一样，关心的重大问题是战争本身。不仅仅是战役，虽然作家已经一再地描述过这些战役，而且战争中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同盟国的关系，也已得到了仔细的研究。有关1940年法国休战的书籍，有关德黑兰和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书籍均不胜枚举。“波兰问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指的是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在战争结束时在波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而不是德国对波兰提出的要求引起了这场战争。相对而言，战争起源不大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一般认为，也许会出现新的细节，但毕竟没有发现什么有普遍意义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答案，也就不必提出什么新的问题了。我们看看那些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最主要的作家——英国的纳米尔、惠勒-贝内特，威斯克曼，法国的鲍蒙特——全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并且全都发表了他

们在战时，甚至在战前就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20 年，没有几个人会毫无修改地接受 1914 年 8 月对战争所作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20 多年则几乎每个人都接受 1939 年 9 月对战争作出的解释。

当然，也可能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不同于任何其它重大历史事件，它在当时已有尽人皆知的简洁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也决不会为后世的资料和研究所改变。但是，看来 100 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看这些事件时未必象人们在 1939 年时的看法一模一样，因此当今的历史学家应当探索的是预测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判断，而不是重述过去的判断。历史学家们忽视这个主题是确有其现实原因的。每个史学家都力图成为超然的和公正的学者，选择题目和作出自己的判断时不必考虑环境。可是，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需要纵然不自觉，也要作出反应。例如，著名的陶特教授以其著作改变了我国中世纪史的研究，他从侧重于政治转到行政，毫无疑问纯粹是为了抽象的学问。同样，20 世纪的历史学家培训出可能成为文官的人，而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却培养政治家，这与上述变化，并不是毫不相干的。论述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必然会考虑，哪些方面仍然可以为目前提出问题或提供答案。任何作家无不打算写一部能引起别人兴趣的书，但决不会去写一部连自己也兴味索然的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事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疑难问题。许多人，特别是协约国的人，认为战争是一场艰苦的竞争，很象 19 世纪的一场拳击赛，要持续到格斗的一方筋疲力竭倒地为止。

止。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人们的思路更加敏锐,这时他们才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可能因卓越的战略或政策而提早结束。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一般都设想再不会有另一次大战了,因此,对上一次战争的研究看来没有为现代提供教训。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时,引起战争的主要问题仍然居于国际事务的中心。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德国问题。协约国可能认为,这场战争是由于德国侵略所造成的;德国人则可能回答说,那是由于它们拒绝承认德国应该享有作为一个大国的公正地位而引起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德国的地位都是有争议的问题。世界上除德国之外,从苏联到远东都还存在一些其它问题。但设想一下,只要德国人同他们从前的敌人和解,这些问题都将易于处理,并且还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这种设想是合理的。因此,战争起源的研究就具有迫切和实际的重要性。如果能使协约国各国人民确信德国的“战争罪责”并不真实,他们就会放宽凡尔赛条约中的惩罚性条款,并接受这样的看法:德国人民也同他们自己一样,是一场自然界大动乱的牺牲品。反之,如果使德国人相信自己负有战争罪责,他们就可能接受凡尔赛条约,认为那是公正合理的。事实上,“修正论”采取的仅仅是前一个方针。英美的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的史学家,都在努力说明协约国政府是有大量罪过的,德国政府比想象中的1919年和平缔造者更为清白。没有什么德国史学家打算作相反的论证,这是很自然的。甚至最冷漠的史学家,当他的国家在战争中被击败,并在战后蒙受屈辱时,也会感到爱国心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战争爆发前,每一个协约国的外交

政策都曾经是争论的题目。英国批评格雷的人、法国批评普恩加来的人、美国批评伍德罗·威尔逊的人——更不待说攻击沙皇政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现在已发展成为学究式地拥护“修正论”观点的人了。在国际上和国内的这些是非之争已经无关紧要了，但他们大大激发了人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兴趣，这一点就足够了。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却一直缺乏这种原动力。在国际方面，德国作为一个大国，几乎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不是世界事务中的中心问题。苏联取代了它的位置。人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战争期间与苏联交往中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与德国交往中所犯的错误。而且，由于西方大国和苏联双方都曾罗致德国的不同派别作为自己的盟友，所以关于战争谈得越少越好。德国人赞成这方面的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坚持他们的国家仍须受到大国的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率先认为欧洲不再决定世界事务——用这不言而喻的暗示，说明德国再也不可能发动一次大战，从而可以让德国在没有干涉和监督的情况下自由活动。在国内方面，情况十分类似。战前，同盟国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确实比1914年前任何已知的争论都更激烈。但是战争期间这些竞争者和解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渴望今后忘却它。从前鼓吹“绥靖”的人可能更理直气壮地重申昔日的政策；从前鼓吹抵抗的人，则放弃他们昔日对德国的警惕，而认为需要抵制苏联。

当人们已在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不过，只要仍然存在

较多的疑点和疑问，这个问题或许还会有某些转机。但是，现有的一个解释能使每一个人感到满意，并且看来可能排除一切争论。这个解释乃是：希特勒。他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他的个人意志导致战争爆发。这个解释显然使从丘吉尔到纳米尔^①这些“抵抗分子”都感到满意。他们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解释，并始终坚持不变。他们会说：“我们已经这样告诉过你们了。从最初一刻起就抵抗希特勒，此外别无选择。”这种解释还会使“绥靖分子”感到满意。他们声称，要不是德国处于一个狂人控制下这一不可预测的现实，绥靖就是明智的，并且很可能是一项成功的政策。除了少数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外，这种解释尤其会使德国人感到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就力图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协约国，或力图证明没有任何人有罪。把罪责从德国人推给希特勒个人，这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希特勒确实已经死了，他在世时或许曾极大地损害了德国。但鉴于他最后在地堡死去，他已以死抵罪。身后的罪责再多，对他也没有什么伤害了。一切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众多的集中营，毒气室——都可以一股脑儿推给无法申诉的希特勒去承担。由于希特勒有罪，所有的其它德国人就可以自命无辜，而那些过去最狂热地反对德国负有战争罪责的德国人，现在却成为最坚定地宣扬德国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一些德国人还对希特勒的邪恶穿插上效果极佳的情节，因为他显然是一个混世恶魔，理应遭到坚决反对。因此，谴责希特勒之余，剩下的任何罪责都可

^① 纳米尔(Sir Lewis Burnstein Namier)，原籍波兰的英国历史学家。
——译者

以诱诸法国人，因为他们在 1936 年没有从莱因兰驱逐希特勒，或者推给张伯伦，因为他在 1938 年 9 月畏缩了。

人人都乐于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原因。那么，“修正论”还有什么必要呢？少数持中立立场的人（特别是爱尔兰人），提出了一些不满意的怀疑。然而，经常参与反苏冷战的那些人，甚至在反德战争中持中立立场的那些人却默不作声；但另一方面相似的理由也正中苏联史学家的下怀。在美国仍然存在一个坚持修正论的学派——一次大战后幸存下来的老兵，他们仍然把本国政府看得比其它国家的政府更坏。从学术观点来看，他们的著作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种修正论主要论及对日战争，因而是有道理的。是希特勒公然对美国宣战，而不是正相反；要不是希特勒无缘无故地对罗斯福开战，人们就很难想象罗斯福怎样能使美国参加欧战。即使就日本而言，也不存在更多争论的余地，因为战争已使这个问题不复存在。过去曾有过一个利害攸关的实际问题：美国应该是与日本合作还是与中国合作呢？这个问题已由事态本身作了答复，而事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的混乱而造成的。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唯一可靠的朋友；因此，就某一部分人看来——当然是在一部分日本人看来——对日作战显然是一个错误。

对当前政治的这些考虑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为什么不是激烈论争问题的原因。然而，却不足以说明历史学家几乎是普遍的一致。甚至最“热中于此的”学者也受学术标准的影响，何况许多学者并不都是十分热中的。如果证据是充分矛盾的，无论公认的意见怎样被广泛地接受，也会

很快发现学者们会对它开展争论。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那是由于两个显然矛盾的原因——证据太多，和证据太少。证据太多，是指为了在纽伦堡审判战犯而搜集的那些证据。尽管这些文件以其浩繁的卷帙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历史学家要使用这些资料却是危险的。作为律师诉讼事实的基础，这些资料是仓促搜集的，而且几乎是随意凑成的。这不是历史学家的做法。律师的目的是办案；而历史学家则期望弄懂一种形势。使律师信服的证据往往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而我们的治学方法对于他们又似乎是异常不精确。然而，即使是律师，现在对纽伦堡的有关证据也肯定产生了疑虑。这些文件被挑选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受审人的战争罪责，还为了掩盖起诉的大国的罪责。如果组成纽伦堡法庭四大国中的任何一国单独主持此事，那它就会更加肆意毁谤。西方大国将要提起苏德条约；而苏联则将以大谈慕尼黑会议和更加暧昧的交易来反唇相讥。既然是四强的法庭，唯一可能遵循的方针就是事前假定只有德国一国有罪。判决在审判之前已作出；文件只是被用来证实早已确定的结论。这些文件当然是真实的，但却有“掺杂”，而且任何一个指靠这些文件的人都会发现，要避开这些“掺杂”的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寻求以更独立的学术研究方式来收集证据，就会发现我们的处境比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前辈要糟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除意大利外的所有大国都几乎完全公布了它们与战前危机直接有关的外交档案。另外，还有已出版的多卷文件集都或多或少地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奥匈帝国文件追溯到

1908年，英国文件到1898年；德国和法国的文件到1871年；俄国的出版物虽然不完全，有空白，但也卷数甚多。我们可能抱怨缺乏意大利的文件，现在这一点正在得到补救，正象我们仍然抱怨的那样，还缺乏塞尔维亚的文件。在已出版的文集中，或许会有一些蓄意的删节，而且谨慎的历史学家只有在自己亲自见到档案时才会感到满足。广义地说，空前详细和广泛地了解六大国中五国的外交，这仍然是可能的。但证据仍未系统整理出来。我们通读了这些文件，会发现许多要研究的新题目，要作出的新解释。

比较而言，可用于研究1939年以前的年代的材料确实是可怜的。奥匈帝国已不再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剩下的五国中，有三国直到最近才从它们的档案中提出零星的证据。意大利人已开始补救这方面的遗漏：他们出版了自1939年5月22日直到战争爆发时的文件，而且他们还将把1861年后的文件出版，从而及时地超过每个国家。法国和俄国的政策因它们的档案没有公开而完全无从知道。法国人借口他们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大多数档案均于1940年5月16日在德国攻进色当时在惊恐中付诸一炬。现在，法国正努力从其海外机构重新收集文件副本。苏联保持沉默的理由，正如苏联政策的其他情况一样，人们只能作一些推测：苏联政府是否有些特别不光彩的事情要隐瞒呢？它害怕对其所作所为（虽然极少可能）作普遍调查吗？也许是没有档案——外交人民委员部太无能而没有保存任何档案？或者苏联政府从过去许多争论的历史问题中吸取了教训——即确认某一事实唯一无懈可击的办法是决不提出支持它的证据？三大国方面的这